

面对云南几乎 90%的县(市区)都十分贫困的现状,云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一些国有大企业带头扶贫。给钱了事,难以解决贫穷根源,没有人的现代化,则物质的现代化也无法持续。当看到这个问题症结,一种新的扶贫理念,正在个别企业的扶贫方式中生长……

# 一个“观念扶贫”的样本



■本报记者 陈昌云

作为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的农民工季节工,31岁的周明成来自云南省西南角一个偏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临沧市镇康县,该县和缅甸接壤,这可能是全国唯一的国门设立在县城大街上的边境县份,国门的那一端是缅甸的果敢县特区。

看相貌,周明成依旧是一个边远山区的农民工,而听说吐,了解其工作状况,周明成和边远山区已经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我不仅自己要走出来,还要影响我家乡的人,让他们也走出来。”他对记者说,“我们不仅自己要改变,还要影响家乡的年轻人也改变,来看看外面的天空有多大,多亮堂。”

由当初没开过眼的山区青年,到今天先后管理过约 400 名季节工的“工头”,周明成自己改变了,“我变了,但我不是‘工头’,我有头衔的,我还是党员。”可能是觉得“工头”的称呼有些贬义,周明成赶紧申明,他告诉记者,他的正式身份是“镇康县誉畅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部副经理”。

周明成是红云红河集团“观念扶贫”的一个杰出样本。

面对云南几乎 90%的县(市区)都十分贫困的现状,云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一些国有大企业带头扶贫。多年来,红云红河集团先后帮扶了数个县,集团扶贫总是采取对症下药,并且适合企业自己的特色,找准路子,不是简单地给点钱物,“一扶了之”。比如对一些农民生产生活极困难的山区,集团帮助

解决饮水困难,建市场满足物资交易等,扶在贫困地区人民“痛点”是红云红河集团素来的做法。

对镇康,集团领导认为,利用集团一些生产点需要大量季节工和当地有富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就业等双向需求的特点,有计划有组织招收一些季节工来昆明卷烟厂打工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做的意义很大。”说到镇康农村剩余劳动力到昆明做季节工的各种意义,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如数家珍,“有看得见的意义,还有隐形的意义。看得见的当然就是他们贫困程度的迅速改变。据当地负责人介绍,当地人均年收入达到 800 元左右就算解决温饱了,他们来打工,一个月就收入近七八百元,有些已经超过 1000 元了,等于说,他来集团打工一个月,基本上就能解决温饱了。”

“但这只是表面的贫困,要解决这种贫困好像容易办到。”按照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看法,仅仅用这种经济输血方式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扶贫如果只是给钱给物,等于救急,“如果他们的素质得不到根本的改变,观念不会真正转变,可以救急,你不能救穷啊。他们的贫困在于根子上,这个根子是观念。”

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集团曾经在当地给他们建茶叶基地、人畜引水工程、希望小学、村与村道路修建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于解决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提高经济收入,改善教学质量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考虑,就当地百姓个人的素质而言,不如把他们带出来,换个环境,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有助于开阔他们的视野,更能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谋生的能力。于是,我们想到了在他们那里招收季节工的方式。”

于是,在不放松物质扶贫的同时,“观念扶贫”进入集团领导层的视野,并开始选择镇康作为示范点。

2005 年 9 月,在红云集团成立前夕,包

括周明成在内的第一批 50 名镇康季节工如约来到当时的昆明卷烟厂整理车间。

“全部是男工,那批人至今仍留下的只有周明成等 4 人了。”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这批工人刚来那些年,从生活习惯到工作状况,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任昆明卷烟厂整理车间党支部书记的张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对这批镇康季节工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们和车间的老职工语言沟通有障碍,互相听不懂,其次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排队点名,前面的则点名,就蹲下去了,没个队伍样。大老远出来打工,穿双拖鞋就来了,孑然一身。”张群说,“他们喜欢喝酒,下班后涌进宿舍附近的小饭馆,酗酒后打架斗殴滋事,时有发生,我们很头疼。”

“以这样的素质,单纯的给钱给物扶贫,只会越扶越贫。”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从这些农民工身上暴露的问题,更坚定了我们把他们招来到工厂培养锻炼改变的决心,我们感到,只有这样才是扶贫的好方式。”

三年后,酗酒、打架这些事就彻底消失了,2008 年 11 月 8 日,红云集团跃身变为“红云红河集团”,企业在变,季节工也如蚕蛹蜕壳,变化得很深刻很彻底。

周明成是镇康县忙丙乡人,中专学的是制糖,毕业后的 1997 年进入了镇康糖厂,他本分厚道,看到别人以“送礼”方式获得职位晋升,而自己不会也不屑于这样做。2001 年 9 月,他在伙伴的撮掇下漂到广东打工一年零八个月,“干过工厂质检员,干过推销,开过小卖店。”他说,“别看时间不长,什么苦都吃过,有时钱花光了,没脸向家人要,就推销自己,只要管吃管住,干什么都行,频频清水白菜。”

在广东实在混不下去了,周明成又回到了家乡,“先是在我哥的资助下开了一个羊肉火锅店,没多久也垮了。这时红云集团来招工了,我寻思这是大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不会不好,于是报名了。”

当时的红云集团已经声名赫赫,“报名的人有七八百人,最后只录用了 50 人。”

周明成由于有在广东打工的经历,算是见多识广的人,被企业重用为镇康农民季节工的管理服务者。

从 2005 年 9 月至今,周明成已经来到红云红河集团整整 5 年了,“我收获大,变化也大。交际能力变强了,过去在家里很不爱讲话,以至于性格都比较内向,现在居然要给同伴们做思想工作,我都惊讶自己的这种变化。”

其实,周明成真正最大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他已经无法认同家乡人守着几亩薄地过着饿不死、过不好的生活态度,“来红云几年,在昆明生活,有一件事我始终觉得家乡太落后了,你不知道,前几年在镇康开店的清一色都是外地人,没有一个镇康本地人。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一件衣服一二十元,贩到镇康要卖七八十元,这么好赚的钱,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

周明成工作之余,带着他的老乡到螺蛳湾等小商品批发市场,现场讲解,给他们“洗脑”。“我告诉他们,在红云红河集团打工不是终身的目的,只是一个过程,要珍惜这个机会,借机好好学点儿大城市人的观念,积攒资金,以后自己选择适宜的事,自己干,做自己的老板。”

与周明成同时来红云红河集团做季节工的镇康农村青年雷加盐,今年才 21 岁,他对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红云 5 年工作,教会我要改变活法。”雷加盐告诉记者,他正在靠做工攒钱,然后回家乡开店做买卖,“已经攒了五六千了,再干几年就回家自己干。”当然,雷加盐觉得比所挣来的钱更宝贵的是自己观念的变迁,“在家的時候,没有这么多想法,只想当一辈子农民,在这里工作 5 年后,感到不能这样活,要换一种活法。我回去不但自己干,还要带动乡亲们换思想干,不一定非要种地为生啊,即使种地,也要

讲科学,不然辛苦一年到头,只能糊口,有什么意思。”

周明成中长期的打算则是要与集团结为一体,“只要厂里还需要我,我就一直干着吧。以后的想法是,孩子逐渐大了,要在大城市受教育,需要钱,老婆能自己开个店就好了。”

当然更大的信心来自红云红河集团这个大“家”给予他的安全感,“在集团打工,五大险人家给买了,宿舍水电免费使用,有专门的食堂,可以天天吃肉,尤其不用考虑工资是否能按时发放,按时作息,生活有规律,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单位?工资收入也许没有沿海那么高,但支出低,一个月除了 200 多元的伙食开支,基本攒净钱,实际收入比沿海高。”在广东漂泊过的周明成把集团和沿海私企作了一个客观的比较,他记得自己在广东打工一年八个月,回家除了路费,一文不名。

从 2005 年到现在,红云红河集团仅从镇康就先后招收了近 400 名农民工来厂上班,大多数人干上一年两年就走了,“镇康来的第一批农民工目前就剩周明成、雷加盐等 4 人,坚持到今天,集团像铁打的营盘,季节工则像流水的兵,其实我们很高兴,400 名农民工对于改变当地人的观念,意义可不小,这些人到集团,到大城市开了眼界之后,回到家乡,要么自己创业,要么利用所学到的综合素质又外出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打工。”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人数不多,但示范的效应却很大,很多当地人在价值观方面受这些季节工的影响,这正是我们集团扶贫的重要目的之一。”

实际上,除了镇康,集团这几年还使用了省内寻甸、嵩明等县的农民工逾千人,来去未尝不是好几十人次,“这些人对于传播集团企业文化,传播先进的价值观念,意义都很大。而他们回到家乡后,示范作用就更大。企业一定程度上成为先进文化的‘播种机’,我们对此很欣慰。”

新华社记者 周科摄

# 长沙“爱心大接力”出现转折

## 28000 元“救命钱”被匿名送回

新华社长沙 11 月 6 日电(记者苏晓洲)连日来,湖南省衡东县农家小女孩“思思”一家寒夜中丢失“救命钱”的不幸遭遇,在省会长沙各界引发一场感人至深的“爱心大接力”。5 日夜,这一事件出现转折:长沙警方根据一匿名电话的指点,在闹市区一座立交桥下找到了一个装有 28000 元现金的袋子——“捡钱的人”把钱送回来了!

2 日夜,长沙气温骤降,寒风彻骨。晚上 9 时许,湖南交通频道一则关于湖南省衡东县农家小女孩“思思”一家在长沙遗失 28000 元救命钱,举家在路边抱头痛哭的消息,紧紧揪住了听众的心。的士司机、私家车主等从四面八方赶到出事现场,2 个小时内现场捐款超过了 50000 元。虽然电台随后呼吁人们暂停捐款,但这场“马路爱心大接力”仍持续到子夜。3 日到 5 日,社会各界对事件的关注还在升温:媒体广泛报道,上门探望、为“思思”送钱送物的人们纷至沓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交通频道为身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思思”创建了“爱心病房”,还宣布为她减免 20000 元医疗费。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捡钱人”的“全城大搜索”也在长沙展开。人们致电媒体,在网上发帖,开设并公布“还钱账号”,法律界人士“以案说法”,长沙市警方和出租车运管部门也认真调查。人们普遍希望,那个“捡钱的

人”,能在长沙这场“爱心大接力”中受到感召,主动将“思思”一家遗失的钱送回来。

4 日,一位陈姓的哥主动找到警方,说自己 2 日晚曾搭载过“思思”一家,但这一家人遗失在车辆后座上的包,他确实没有捡到。5 日晚上 9 时 30 分左右,长沙市公安局砂子塘派出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名男子在电话那头称自己 2 日晚乘坐出租车时捡到了一个白色运动包,包带回家后未细看,不知道包里有那么多少钱。连日来,他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得知自己捡到的是小“思思”一家的“救命钱”,想出面归还,又怕被大家误解,所以决定把钱放到一个地方,请警方去取。将信将疑的民警按照男子的指点,来到长沙市新中路立交桥下,从一处绿化带中发现了个白色运动包,打开一清点,28000 元原封未动。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要跳到喉咙眼了,简直太让人难以相信了。我们感谢这位把钱送回来的人,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思思”的妈妈胡新平异常激动。在胡新平身边,“思思”身穿爱心人士送来的新棉袄,在卡通娃娃和粉色气球装点病房中,显得很快活。

此前,“思思”的父亲李正平曾明确对记者表示,社会各界的捐助,在给“思思”治病后多余的钱,他们“一分钱也不会带走,全部捐献给那些更需要救助的人”。

## 朝鲜族政企高层经济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振兴,提高民族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朝鲜族政企业人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争取社会各界对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中心和中韩企业联谊会共同主办的“2009 全国朝鲜族政企高层经济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开始,11 月 8 日结束。

本次论坛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朝鲜族党政

领导、企业界代表人士以及部分学者和专家,以增进友谊、共商发展为主题,旨在推动民族经济的振兴。本次论坛的宗旨是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在回顾民族地区和民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围绕经济建设,总结交流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企业如何把握经济复苏时期的机遇,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步的发展。今年是首届论坛,以后将每年举办一次。(朴英兰)

## 陶一矿 36 万元重奖竞赛功臣

本报讯(通讯员彭忠 李跃振)近日,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陶一矿 36 万元重奖在竞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胜单位和先进个人。综采区、掘进区、洗煤厂等 5 个优胜单位的 782 名职工分别得到了 1.3 万元至 12.9 万元的现金大礼包,这是该矿历年来奖励金额最多的一次。

在 9 月份冀中能源 5000 万吨大练兵劳动竞赛活动中,陶一矿广大干部职工掀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竞赛热潮,煤炭产量创出了 6.7 万吨的今年以来最好水平,总进尺创出了 787 米的二十年来月进最好水平,洗精煤创出了 4.85 万吨的建矿以来历史最高纪录,煤炭销量创出了 5.9 万吨的近年来月销量最高纪录。该矿决定拿出 36 万元重奖在竞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胜单位和先进个人,让他们身披绶带,胸戴红花,以此激励广大干部职工“比、学、赶、超”。



### 道德观察

■李瑾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日前要求各地尽快启动施工作业,确保 2010 年 7 月底前完成所有已建成通车国家高速公路的命名编号、路标、里程碑等相关标志的更换工作。

目前全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突破了 6.5 万公里,按照目前新的高速公路编号方式,几乎现有的路牌全都需要更换,这不能不说是个庞大的工程,到底需要更换多少块路牌,需要花费多少财政支出,交通运输部门应该有笔账,不光有笔账,还应该向全国人民晒一晒。

不久前,上海曾爆出,全市不到 700 公里的高速路,单单更换路牌的花费就高达 2 亿元。从最初相关部门自己透露的 5000 个路牌,一夜之间又改口称真正的更换数量是 25000 个。作家韩寒简单算了一下,不管是最初“每块路牌的费用是 4 万”,还是更正

过的数字后产生的“高速公路上平均每 25 米便有一块路牌”,“如果我开得快,上海市公路管理处上路牌上画点图,就能看动画片了”的戏剧效果,都让公众感觉到,更换路牌中间蕴藏的巨大腐败空间。

一块铁皮,究竟要花多少钱?马路上有业内人士站出来表态,每平方公里的成本在 1000~1500 元左右,一般的路牌为 2.5 平方米,花费也就最多不到 4000 元,为什么上海就要 6000 元呢。这么一算,上海公路管理处又不干了,人家说了,我们这“两亿元”的花费是总开销,包括“支撑结构,基础中如果需要更换龙门架,单单一个龙门架就要 20 万元左右。”那么,上海高速公路更换路牌这项工作究竟需要花多少钱,这“两亿元”的预算究竟是怎么测算出来的,上海公路管理处最后的答案是——“由于部分公路整修工程也将算入此次路牌更新项目中,所以预算总额较难确定。”

口水仗打了一圈,最后还是一个“较准确

## 江西上高: 公车有了 群众监督“身份证”

上高县一辆公车被贴上“公务车”标志(11 月 5 日摄)。

针对公务用车管理难点,日前,江西省上高县出台文件,对全县 275 辆没有明显标志的公务用车实行统一编号,建立台账,粘贴“公务车”标志,为群众监督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畅通渠道。同时,该县向社会公布公务用车使用的六条纪律,让群众举报有根据,监督有实效。这是上高县继今年春节“公车封存令”节支倡廉后,再次向公车使用腐败重拳出击。

新华社记者 周科摄

# 请注意那块路牌

定”,那这“两亿”难不成是信口开河的产物?难以确定,最后只有两个结果,或者高于两亿元,或者低于两亿元。从任何角度看,低于两亿元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那就需要相关部门晒晒账单,让大家看看,究竟哪些钱可以花,哪些钱不该花或者您手大花多了。如果几个政府工作人员算不明白,可以发动有智慧的群众。要是真相相关负责人自己所言,究竟需要更换多少路牌自己也不清楚,不要紧,每天路上跑那么多司机,让他们抽空数一下,也能掌握确切数字,还有算不清的账?

咱们不是矫情,非要跟上海过不去,只是,这种数字游戏,容易被学习。这边走上海一块铁皮究竟要花多少钱还没算清,那边广州又要规范全市的道路路牌,让“LU”和“Road”统一,要是一块铁皮的价格搞不明白,如此连锁下去,全国各个地方都来效仿,这钱花得可真够糊涂,估计谁家过日子也不会不计较到这个份儿上。

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你来我往的口水仗

## 优惠要终止

【新闻记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官员近日声称,鉴于目前经济回暖,房地产市场向好的形势,去年出台的一系列楼市优惠政策有可能在年底到期终止。这些政策可能包括契税和营业税减免、首套及改善型购房按揭利率 7 折优惠、房地产开发项目自有资金金降低额度等。有业内人士就此分析预测,二套房贷政策收紧将向市场传递调控信号,估计楼市阶段性见顶已经不远。

【道德点击】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多个政府部门推出刺激房地产的优惠政策,成了地产大亨们炫耀自己为中国经济贡献财富的幌子。然而,真正论起来的话,掏出真金白银的还是那些贷款买下高价住宅的老百姓。与其取消优惠措施,不如真正查处那些恣意“囤地”及炒地现象。说到底,开发商敢把那么多地块动辄闲置两三年,主要原因就是主管部门的不作为。至于为什么不作为,恐怕“地球人都知道”。

## 公函竟辱骂

【新闻记录】

湖南省石门县委宣传部公函描述《中国妇女报》工作人员带“狗日的”等字眼,日前被当事人告上法庭。这份发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的 15 页公函,题目竟然是“一条披着记者‘羊皮’的狼”,文中不乏“疯狗”、“瘟神”、“丧家之犬”、“黄鼠狼”、“狗日的”等字眼。据称,如此荒唐的公函是由石门县宣传部副部长贺新初起草的。

【道德点击】

如今,类似贺新初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似乎已经越来越忘了自己应该怎么说话了。“一条披着记者‘羊皮’的狼”这样的公函标题,实在堪与“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那句官员雷语一样,显示出权力在手者的霸道和嚣张。不知道石门县委宣传部有没有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至少在贺副部长那里一定是走了过场,应该有点组织措施帮助他懂得应该怎么说话了。

## 官员练长跑

【新闻记录】

从 2010 年起,重庆市江北区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将举行两次长跑达标测试,不达标者将“上榜”公布。其中,40 岁至 50 岁的领导干部 1000 米达标标准为 5 分 20 秒,这是参照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耐力项目测试评分及成人体育锻炼等级标准确定的,同时考虑了机关干部工作性质等因素,并将作为“对领导干部的一种考核”。

【道德点击】

干部长跑考核,别管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归根到底还是免不了唯恐取宠的意味。既然是要鼓励全民健身,就应该再普及健身设施,增加运动场地上多下功夫,实在用不着把长跑引入干部考核的范畴。毕竟,老百姓纳税供养一方政府部门,不是让他们在跑道旁边掐着秒表练长跑的,还是把这份额头留着去对付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吧。

## 足坛反赌忙

【新闻记录】

一场由司法机关强行介入、针对足坛“赌球”的大风暴已经开始,广州、成都、辽宁均有俱乐部内部人士被警方请去“协助调查”,甚至连中国足协的某位工作人员也配合警方进行了“协助调查”。辽宁省治安总队的相关人士还明确表示,相关案件是由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经办。这是打击足球赌博活动领导小组成立三年多以后,“反赌”工作第一次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道德点击】

面对中国足球的这次严惩风暴,中国足协官员的态度是“200%支持警方介入,希望早日铲除毒瘤”。但是,包括假球、赌球、黑哨在内的足球丑闻,难道就与这项运动的公务用军实行统一编号,建立台账,粘贴“公务车”标志,为群众监督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畅通渠道。同时,该县向社会公布公务用车使用的六条纪律,让群众举报有根据,监督有实效。这是上高县继今年春节“公车封存令”节支倡廉后,再次向公车使用腐败重拳出击。

新华社记者 周科摄

打不清,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财政支出的信息披露过于简单,甚至再三改口的一些关键信息,对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互信,产生了极为负面的作用。很多时候,一些部门总觉得自己委屈,总说自己被公众“误解”了。消除误解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坦诚。坦诚就需要建立一套详细的信息披露机制。

11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法院网、法制网上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征求意见稿提出: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公民依法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规定》还明确了法院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六种情形和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六种情形。这么看来,搞清楚一块铁皮的价格事关重大,相关部门也有责任给公众解释清楚一块铁皮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也请人大、纪检、审计等部门,多多注意那块路牌吧。